

严迪昌 著

自选论文集

读中国古典诗词是一种享受，享受着艺术的审美的慰藉。有时也辛苦，但辛苦中却又不时生发出满足的快意或悚然之憬悟——

嚴迪昌

中國書局

严迪昌 著

严迪昌 自选论文集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沙 沙

封面设计：武蕴韬

严迪昌论文自选集

严迪昌 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80 × 1230 1/32

版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0 千字

印张：12

书号：ISBN 7 - 80663 - 348 - 0/I · 215

定价：26.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罄者可由本社邮购。



怀念严迪昌先生

吴熊和

我与迪昌兄结交逾二十年。他博学多才，见解犀利，卓尔不群，乐于助人，因而一见如故。先是在南通、南京与杭州几度放怀畅叙，1986年他调到苏州大学以后，则至少一年一度彼此往来于苏杭两地，对他的为人与治学遂相知日深。

1983年，他在南京大学协助程千帆先生编纂规模弘大的《全清词》，向全国各地征集清词刊本。我将杭州大学所藏清词，全部复印了寄给他。借此机会，我也得以遍览浙江图书馆收藏的种种清词善本。在这之前，我虽读过若干清名家词，但只是出于爱好。及至看到了数百种清词珍品，尤其是明末清初动荡年代那些忧愤深广之作，有着与宋词多么不同的音响色泽，不禁引发了转治清词的念头。后来续有所得，打算写一本《明清之际词派研究》，实在是出于迪昌兄当初的启发与指引。

二百六十多年间的清词，也称得上是有清一代之胜。饶宗颐先生有《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一文，认为“词之有清，等于诗之有宋。以诗况词，宋词可抵唐诗，清词可抵宋诗，故清词之地位，可与宋诗比拟相等”。迪昌兄一生致力于清词研究，更认为清词是“一代新词”，不是唐宋词的回归，具有宋词之外的另一种“新质”。清词以数量言，全清词人逾万，多过两宋词人五倍；词作超过二十万，尤为全宋词的十倍。以大家名家言，清代词人各有独造而为两宋词人所不能掩者，亦不下十数。但是汇集整理清词这么夥颐魁硕的文化遗存，三百年来竟无人措手。而且



时代愈往后，其困难必然愈多。首先是无所依傍。乾隆时的《四库全书》，清词总集仅收孙默所刊《十五家词》一种，别集仅收曹贞吉《珂雪词》一种。《国朝词综》及其续编、补编，皆旨在存人与选词，不收完整的部帙。其次是文献放佚。由于迭经战乱、历朝禁毁和公私藏书失收，清人词集自然愈传愈少。1929年叶恭绰先生发起编选《全清词钞》，征集到清词三千种左右。至于编纂《全清词》，其启动则又在几经变乱的五十年之后了。近年出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号称赅备，累计著录清人词集一千九百六十八种，存世清词实已不足二千了。我们衷心感谢千帆先生和迪昌兄等《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的同仁，他们及时立项，周密规划，精心編集，终于使《全清词》中的《顺康卷》首先问世。1994年由中华书局先出二册，2002年煌煌二十册八百余万字全部出齐。

清词之盛，一在清初，一在清末。李一氓先生生前钟情清词，富于收藏。其《瑶华集》跋谓：“言清词而不重清词初期，则有清一代无词。”对清初词特别推重。清初即指顺治、康熙两朝，历时近八十年。《全清词·顺康卷》收录词人二千一百家，词五万余首，数量已远远超过一部《全宋词》。沧桑易代之后，身丁巨变的清初词人又经历了南北几次牵连极广的大案大狱，在历劫磨难中不断积蓄的惊惶、郁怒、失落、悲怆之情，尽发于词，展示了清初词人一个特殊的心路历程。在顺康盛世普庆升平之余，另一种与之不谐和的变风变雅或许正是当时不断弥漫的主旋律。清末则包括道光至宣统五朝。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六十余年间，中经两个庚子年，即1840年与1900年。迪昌兄即以此为近代词的前后标志。前一个庚子，鸦片战争爆发；后一个庚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龚自珍的《庚子雅词》和王鹏运的《庚子秋词》，“架起了前后两个庚子之间绚烂的词史画



卷”。在完成《全清词·顺康卷》初稿之后，迪昌兄又以历年冥写展钞，辛勤搜求所得，独立编成了《近代词钞》三大本，计收近代词人二百零一家，词五千五百余首，凡一百五十万字，并为每个词人写了评传，“备见近代词整个面貌”。1996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清词最为辉煌的两端，清初词的全貌和清末词的概貌，就都经迪昌兄之手而再现当世，两者都与清词研究有奠基之功。这是深为迪昌兄庆幸的。

《清词史》是迪昌兄在清词研究中的又一重要贡献。他在《全清词·顺康卷》初稿交出后开始动笔，重点自然是清初与清末，实现了他素来“审辨史实，全景式探求流变”的主张。他写这近五十万字的专著并不费时，不过自秋徂冬四个月，但写得气脉舒张，笔酣墨饱，痛快淋漓。这不能不归因于作者的久蓄于中与持满而发。1990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在得到赠书后就穷日夜读完。除了知识广博，议论、考证俱见精彩外，更令我敬佩的是贯穿于全书的作者独具的“史识”与“文心”。迪昌兄熟谙清代史事，但他往往更多地从清词中感受其所折射出的世道人心，从而唤起内心的强烈共鸣。杜甫诗云：“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清代词人与异代知音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无形纽带，使这本《清词史》具有一种令人感奋的勃然生气。

迪昌兄研治清词还撰有几种重要的副产品。如《阳羨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出版）、《近现代词纪事》（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另外《清代三千词人传略》、《清代词人疑年录》及《清三百年词人年谱汇编》多种手稿，希望能及早整理出来。

继《清词史》之后，迪昌兄又写了一部《清诗史》。清诗同清词一样，也超轶元明，号称“中兴”。清人诗集目前尚可得见的不下四千种，诗人更以万数。清诗专集，李灵年、杨忠两先生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先生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等书，皆有著录。清诗受到的关注，一向甚于清词，清诗研究的基础因而也较清词更为丰富厚实。较早的如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晚近的如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皆论述有序，取材弘博，发明众多，尤长于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某种程度上也可作为一种清诗史来读。1992年我路过苏州，迪昌兄正冒着盛暑，挥笔不休，数月间写成了与他的《清词史》堪称合璧的《清诗史》。全书八十余万字，比《清词史》更为增广。经过数年耽搁，先在台北初版，2002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重排再印，大陆读者是在此书定稿十年后方始读到。

优秀的学术著作决不随人俯仰，与俗沉浮，而是善于张扬学术个性，保持着书立说应有的独立品格。迪昌兄的《清诗史》，一面从宏观上梳理整合清诗二百多年间的风会流变，一面在具体论述中对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进行族群考察和艺术定位，力求复原清代诗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文化生态与诗性精神。书中独特的视角、新颖的命题，乃至别具一格的结构布局，在有关清诗的同类著作中显得那么不同凡响，令人感到迪昌兄对清代文史理性沉思所不断取得的新收获。

从《清诗史》中还可看出迪昌兄为自己设置的一些新的研究风标。主要是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角度拓展研究领域。明清以来，包括苏浙皖在内的所谓江南地区，原有的文化强势日益集中提升，江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已被普遍认同，而世代绵延的文化世家自然是江南文化根基深厚的重要支柱。这是研究清代文史不能不予特别关注的。另外，迪昌兄除了进行纵向的史的研究，他还打算倾注心力作横向的个案研究。近年来他和我多次无拘束地长谈，对上面说到的这两层用意再三进行讨论。收在这本文集集中的，就有多篇实践他的主张。经他指导的几位及门博士，也正在继续为此做出扎实成绩。



迪昌兄曾于知命之年，“发愿成有清一代诗、文、词三史”。清词、清诗二史业已传诵于世，为清文作史，可惜只能留待有志于此的后继者了。

由于一生劳瘁，迪昌兄去岁不幸盛年早逝，我感到十分悲痛，当时写了一副挽联以表哀思：“一见诧神交，东南弟子倾风采；数奇憎命达，吴越宗师叹莽榛。”现在他的夫人曹林芳女士将迪昌兄历年发表的单篇论文结集出版，嘱我在书前写上几句。兹略记迪昌兄的学术生涯与往昔交往，再次表达我对他的尊敬与悼念。

2004年3月26日于浙江大学



目 录

怀念严迪昌先生	吴熊和 1
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断想	1
以累积求新创	
——我对清代诗词研究的认识	13
筏上戈语	
——治学之道	18
心态与生态	
——也谈怎样读古诗	24
清诗平议	31
兴化李氏与清初“昭阳诗群”	45
赵执信论	56
查慎行论	76
论黄仲则	96
清代江苏诗人沈谨学	119
论江湜的诗	
——清诗散论之一	125
忧生悼世感无端	
——读黄季刚先生诗稿	140
我读清词	150



老树春深更著花	
——清词述略	156
论阳羨词派	167
《乐府补题》与清初词风	178
我读朱彝尊词	194
万树三考	201
《西青散记》与《贺双卿考》疑事辨	213
海宁查家词话	
——兼说“浙派”中期词研究	222
论史承谦及其《小眠斋词》	
——兼说清词流派之分野	228
论郑燮的《板桥词》	
——清词论丛之一	253
近代词史的再认识	262
2 关于吴文化研究的断想	279
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	281
“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	290
明清新兴世族与吴文化的发展	309
徽人与近四百年间吴地文化	331
《唐宋友情词选·前言》	348
《全元明清词精选·前言》	353
《元明清词·自序》	357
《清词选注·序》	361
《清词纪事会评·序》	364
说“足”与“善”	
——《全清词》编纂手记	365



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断想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史和各类文体史的著作时有问世，几辈学者曾为之付出了无尽的心力。尽管从总体看来，灵奥迷离，距胜境尚远，文学历史的探幽求真的工程仍还处于筚路蓝缕阶段，但山林初启，先行者们诚为与有功焉的。

这原是一项艰巨的宏伟的整体性工程。所以，任何一蹴而就之想或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都不免是种痴幻虚妄的念头。才气替代不了史识，而史识必滋养自史实。离开对史实的全面性的发掘、整理、把握、梳辨，换句话说，倘若对文学历史客观存在的真相未能充分认识，就绝不可能**全景式地复活并再现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卷**。这样，再新颖再锐利的手眼（方法和观念），都只能翘首天外而导致脱靶，甚至重蹈误区。同时，也难以有足够的能量驱去既存的众多传统习惯的观念和陈腐、偏执的方法。文学史研究工作者要充分地、审慎地汲取并利用迄今为止的一切既有研究成果，又完全不必墨守教规、步趋前贤，在“师法”面前不敢越雷池半步。全方位地整体把握并重新审辨史实，还中国文学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当前第一义的职责，也就是艰巨的需要集思广益（不是集团型密集攻坚）、循序以进的首要任务。

中国文学的历史，在消长兴替的演化进程中回环发展、绵延流变了数千年。其繁复变迁的错综多向性，不仅体现在数千年流转的全过程，而且纷呈多样、具体变异于各个历史时代以至某一特定时代的各个时期的时空间段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截取出任何五十年的或一个世纪的文学历史来加以研讨时，都能从这特定时空间段里寻求出有异于别一个五十年或一个世纪的**文学现象和演化轨迹**。而这种“现象”和“轨迹”的不断更变性和独异性，自中古以来，特别是唐、宋以后，尤见



突出，尤为明显，变迁的周期愈益促迫迅快。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简趋繁、日渐繁复的进程，人的灵智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的演进而愈趋敏悟扬厉，人的情感活动也随之而愈见激活，更益丰富深细。其实即使处于昏黯混浊、压抑沉闷的历史阶段，人的灵智和情感活动也从未真正被扼制窒息过，无非是表现形态有了别一种的变异而已。

我们又知道，“时代”，原也只是抽象的概念，当人们具体指认或描述某一特定的时代时，这“时代”方始具有实际的内涵，其内涵实即特定的时空的复体组合。而任何一个时空阶段无不处于运动的行程中，也正是运动将一个个时空间段联绵不绝地延伸向前，人类的历史也就在这无数的特定时代、不尽的时空运动的过程中构建而成。所以，没有过程，必然不成其为历史，同样，没有基于史实的文学实践运动的全景式的过程的描述和重现，也就构不成文学史。

再说作为文学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是活生生地生存、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即特定的时空间段中的。所谓“活生生”，是指诗人作家们都生存、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里。这种具体性，既表现在他们各有一定的历史社会的背景，各有笼罩着他们置身其间的时代的文化、学术氛围，而且都活生生地运动在各式各类的人际关系中。关系，是社会人所无可摆脱的网络，任何一个作家诗人，无不有着师承关系、亲族关系、乡邑关系、交游关系，等等。他们全都程度不等、形态各异地活动在一个个群体之间。

如果说，作家研究、诗人论之类文学批评，主要任务在于研讨某一作家某个诗人的文学创作的成就，论定其艺术造诣的话，那么，文学史研究则关注的是一个作家以及他们相互关联所构成的文坛景观和演进的轨迹。事实上，作家论要能深入地探寻研究对象的历史成就，也必须将其置于纵向的渊源流变和横向的互为关系的交叉点上，惟有如此，始能确认他的史的位置即成就的高下、新创的大小。但是，如果说这种探寻多少还是静态考辨或特写镜头式的话，文学史研究则必须是不断扫描式地作顺向甚至逆向观照。



正因为文学史研究更重要的是探求存在于史实中的作家们的关系、关联所构成的文坛景观和演变轨迹，所以我以为文学史就绝不是简单地排名次论位置，即以是一流抑是二三流，是大家还是名家或小家的分等列传的编缀。若审慎地考辨史实，全景式地再现文学历史画卷，就会区别出文学史和作家研究应有的差异。这里随手拈二个例子，一是南宋末期“江湖诗派”中的陈起，一是清初扬州词坛上的孙默。要谈文学创作实践，陈起和孙默显然算不上名家，从残存的篇章及他们同时作家的文学中都可以肯定这二人并无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无论是文学史或文体发展史的研究，陈起、孙默的“史”的重要位置均轻忽不得，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在各自特定的诗坛、词坛上影响至为巨大，是一种重要的史的现象。关于陈起，近年已有专家注意到其对一个流派所起的推波助澜的贡献，称赞为是文学史上不多见的有识的出版家和文学事业的组织家。孙默同样是一个奇特的文学史人物，这位原籍安徽黄山的畸士，清顺治间即流寓扬州，一面让子弟经商，一面积极周旋于文坛，串联往返于大江南北，组织刊刻大型词总集《留松阁国朝名家诗余》，先后四批共刻成十七种，要不是病逝的话，他将按计划汇刻百种左右。这部总集固是清词第一部大型汇刻，与当时在扬州的王士禛、邹祗谟合编的《倚声初集》，都是关系到总结明词、开启一代清词的重要文献。不仅如此，关于孙默声称要归隐黄山，而掀起的数以百计的诗人词家的赠行之作的热浪，更是清初扑朔迷离的文学实践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果文学史等同于一般的作家研究，这些文学现象和文坛全景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再现，从而，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互相关联、影响的面貌也难以得到揭示。舍弃这种种“现象”，又何从探寻规律、把握特质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现象绝非偶见的罕例。即以明清二代皖籍流寓江、浙两地的大批由商转文的文学世族而言，他们对吴越文学文化的兴盛发展所曾起过的重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就应是文学史研究工作必须加以描述和论定的。特别是明末清初江山易主、江东南旧有文学世族如吴门文氏、太仓王氏、长洲王氏（王鏊一支）等一再罹祸、惨遭打击而日渐衰落后，流寓扬州、苏州、杭嘉湖地区的歙籍文学家族填补了这种衰缺。就拿“浙西词派”



来说，如无汪森的资助，《词综》就难以在康熙十七年（1678）刊刻，也就配合不了“六家”旗帜的张扬。后来厉鹗沟通杭州、扬州二地词坛，“浙派”愈见炽盛，更是得到大批原系统籍的词人的支持和鼓吹，其中扬州小玲珑馆主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作用尤大。如果只讲究是哪一流之类的标准来撰史，诸如此类的史实将必定被摒除，各种极为活跃、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群体形态的生动现象，势将继续湮没下去。

前文谈到历史就是无数特定时代、不尽的时空运动的过程所构建而成，这也就是说历史从不重复，因而无疑也不可取代。所以如果上述关于诗人作家的诸种关系以及群体现象、坛站景观只是侧重讨论共时性文学历史史实的话，那么，对绵延回环、流变演化的历时性运动过程，文学史研究同样应更多地关注诸种“关系”和“现象”，从而去梳理出轨迹和脉络。

试以诗歌史上宗唐溯宋的史实现象为例，这简直是两宋以来文学历史上的一个怪圈，殆如“言志”、“载道”，抑或“缘情”、“写心”的种种论争一样，始终纠葛缠绕，似难跳脱圈外。然而细加审辨，应该承认同样一个“复古”旗号或旧话重提，其各各的表现形态即文学现象和演变足迹既非简单的重蹈旧辙，也不尽是逆势性回归。这可以举一些小例子。如在诗歌发展史上，中、晚唐诗人贾岛、姚合原非“大家”之属，在作家研究的系列里不仅不曾占过显眼的地位，相反，较之以“盛唐气象”、李杜风格，贾、姚诗风每被置于近乎“自惭形秽”的边角上。“诗圣”、“诗佛”、“诗仙”的身躯几乎将他们只挤剩下一袭寒酸瘦苦的衣着形相。可是，文学的历史上却又代有沿承、彰扬贾、姚诗艺审美倾向的作家，而且至少有二个诗派在各自的历史时期显示其特定的影响。一是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一是清代乾、嘉之际以李怀民兄弟为代表的“高密诗派”。关于“四灵”应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但文学史研究决不能轻率地跟着钱谦益之辈也以“语近意不远，骨癯髓已枯”（《初学集》卷十三《书四灵诗集》）一类断语来取舍之，对“高密诗派”的考察也一样。文学史应该研究这种类似复辙的现象，并从特定的时空段上去审辨他们在纵向流变过程中各自呈现的独异性和存在意义。事实上，“四灵”的标



举贾、姚“三妙”所针对的乃“江西诗派”的某种习气，而“高密三李”和他们的乡邑诗群以及遍布远至岭桂的诗派弟子们，则是不满于清初钱谦益、王士禛所开诗风所发生的肤廓诂订弊病。所以，不仅是这二个同属宗尚贾、姚诗风的流派所处时代的盛衰各不相类，就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审美视角也并非雷同，审慎的文学史研究者务须深入地考辨其异同。能如此，贾岛、姚合在诗史上的座标固可更见准确，而这一诗艺派别的流风余韵的脉延过程也能清晰理顺。又如南宋四大家之一杨万里的“诚斋体”，在宋诗研究领域固然久被轻忽，其诗歌艺术的成就也远不如陆游、范成大那样地走红而为现代学者所重视。至于传统诗教以及惯于扛大旗好标榜杜甫、韩愈或黄庭坚以为渊源的严重倾向，更造成一种似乎明言崇尚“诚斋体”则难免么魔外道走旁门而非“正宗”的讥嘲的心理。于是，承沿“诚斋诗体”脉流的诗人之集，自作或别的名流所作的序文无不讳言真相，每多侈谈“学宗韩、黄”或“少陵法乳”之类空话。一种实际存在的史实被掩遮或曲解，一个诗歌艺术的流变现象也障而不闻。三十年前读旧刊本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读到“至作诗学诚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惟有江弢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敌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一段文字，甚觉新精，后读江湜《伏敌堂诗录》，深叹钱钟书先生所论的警策，诚独具史家慧识。“为……未定之论误”虽只寥寥数字，实是重新审辨史实后的卓见，从而一扫陈见，包括自“同光体”以来的陈见，披露出“诚斋体”在文学历史流变行程中的一个真相。事实上，“诚斋体”对明代公安派到清代性灵说均有深层的关系，而要理清此类问题绝非简单地划出宗唐还是宗宋这样的线路所能完成的，实际上这类现象都是考察“言志”还是“缘情”，“载道”还是“写心”等有关诗的本体功能问题的重要史实，要说寻觅规律，必需由此入手。说到这里，我还想起郭摩，这位嘉道年间的卓特文学家由于位卑名微，特别是由于常州词派系统的谭献给予一个恶谥式的“词尚深涩，而频伽滑矣”（《篋中词》）的评论后，他在文学史上的应有位置被粗暴地取消了。近今的选本大都无人选其人其作，即使入选也是点缀而已。其



实，郭氏《灵芬馆集》的诗固是生气活力弥漫，为“诚斋体”的一个新的实践者；而其词则是挽回空枵餽钉的浙派末流的一剂强心药石。尽管今存《灵芬馆集》词均为中年前所作，后期词已不可觅见，但仍可看到一股新的情韵的流转。而他的《杂著》中大量序跋所表现的“一代有一代之作者，一人有一人之独至”；“不欺其志，即可以不背于古”等等强调贵在保持抒情主体的“我”的论述，在当时是继袁枚之后在理论上更具思辨锋芒的革新人物。可惜“正宗”的传统仍顽强之极，郭氏的努力很快被在理论上实系重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正统诗教的常州词派所泯灭。

纵向（包括顺向和逆向）的梳理源流（不是一般所说的传统的“推源溯流”），也即现今所说的历时性地考辨史实、汇拢现象、复活历史原貌的工作，如同在历史的一个横断面上广泛、全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全景式描述文学实践活动一样，都是艰巨辛劳而又宏伟的工程。但非如此不能真实地再现历史，不可能产生符合历史科学原则的文学史著作，而且许多问题也无法真正解决，许多关于作家、流派、群体的研究更难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跳出传统习惯的羁缚。上述有关贾、姚诗风和“诚斋体”流变的问题只是未见准确把握的一二例子而已。此外须重加审辨的还有如“明七子”的历史评价问题。前后“七子”在明代历经公安、竟陵的批评，嗣后自钱谦益起在整个清代更是屡见指摘。近数十年的文学史著作大抵沿之而置于否定之列。“七子”的功过原本是很复杂的问题，袁宏道、钟惺、谭友夏以至钱牧斋的攻伐也各有不同的角度，后人其实应有所辨认、细加审察的。如果将“七子”特别是“前七子”放在历史的纵横交叉的特定时空上予以考察，或许会有更公允准确及全面的评鹭。有一个现象就很值得参照，即明末清初声望极高、影响极大的陈子龙、顾炎武、侯方域、屈大均以至曾问诗学于“云间”的陈维崧等，几乎都曾瓣香或师法于“七子”诗派。这里起码说明一个问题，“七子”在诗的审美追求上有它一定的价值和效应，决不是“瞎盛唐”一句所能骂尽。难道上述籍贯分布于吴中、云间、商丘以至岭南的均足称一代英才的诗人全都盲目至于分不清真贋？不仅如此，明末清初以冯舒、冯班



兄弟为代表的“虞山派”（该派之宗尚玉溪生诗风与北宋初年“西昆体”的学李商隐，同样类似前述“永嘉四灵”与“高密诗派”的现象一般，值得重新审辨）是无情的反“七子”派，然而山崩海立、社稷倾垮的历史现实却将冯氏昆仲与陈子龙、顾炎武等一起抛向了一个风雨飘渺的悲怆之谷，他们几乎先后合辙地弹奏出家国苦恨的心曲。于是，在对待“七子”诗风的审美情趣上截然相异的歌手，却走到了共同的歌哭悲欢之路。当然，可以用一种简捷的理论来解释这现象，这就是“时代精神”论，内容决定论，事实也确是特定的时代决定了这批诗人心曲的哀伤，志士仁人难有多种道路的选择，特别是“忠爱”教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这毕竟又否认不了一个事实，即“七子”的诗艺追求或玉溪生的风格倾向都不仅不妨碍心声的传述，而且在艺术功能上无伤各见春秋。顾炎武等诗作的恢宏、开阔、沉郁、雄丽，毫无疑问与“七子”所追求的“盛唐气象”有关。“瞎盛唐”固然有可讥嘲之处，然于音律、气势、声韵、格调的研析体微，即更多地靠实践经验（如同书画的由经验上升到感悟）而较难言传的这些研讨，是不能也不应草率否定或无视的。类似这样可供逆向观照的还有同是曾经心仪瓣香“七子”的“云间派”（以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为首）与“雪园诗社”（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差异性，这是考辨“七子”诗风流转变迁的又一重要现象。云间诸子与侯方域在评价杜甫诗的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这是非常令人饶有兴味的一个有趣的论辩，在这场论辩中，与“云间派”有很深渊源，又与侯方域等商丘诗人群交往频繁、情谊深厚的宜兴任元祥，他在《鸣鹤堂集》中有好些篇与两方面展开驳难的文字，是考察明清之交诗坛群体运动及诗风消长交替过程的重要史实，可惜也少为人注意和研讨。我们一些文论选本往往在前人已有论定的范围内择选，视野不愿或不屑稍稍展开一些。

这里涉及到对文学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某些非学术性因素（包括非文学性因素）的忽视的问题，这种忽视常常导致我们步趋前人的“大家”、“名家”以及“名流”、“末流”的圈定而决定取舍。前面谈到的郭摩的被轻视，这里的任元祥文字的被忽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关于所谓非学术因素的现象很不少，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即与“太有力”的官宦权